

再谈《七发》及唐前“七体”赋作的主旨

李宏伟¹, 管宗昌²

(1.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图书馆, 重庆市 401120; 2. 大连民族学院 文法学院, 辽宁 大连 116600)

摘要:《七发》除了“戒奢”之外, 还有一条讽谏主上举贤任能的主旨, 由此可以看到诸多先秦时期文学因素的影响。自《七激》始, “七体”的题材由问疾转变为招隐, 但这一讽谏主旨一直未变。这成为其后七体作品的基本内容, 只是在不同阶段、不同作品中表现程度与方式有所差异。这一主旨符合文臣的基本精神诉求, 《七发》、《七激》等作品的宛转表达方式又为他们提供了安全合适的范本, 最终造就了七体的模拟继作之风。

关键词:七体; 主旨; 举贤任能; 讽谏; 七发

中图分类号: I207.224 **文献标识码:** A **文章编号:** 1673-9841(2011)04-0181-05

一、《七发》的主旨

《七发》可以看作是“七体”的开山之作, 对后代“七体”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。它在“七事一文”的结构、主客对答的模式、铺排渲染的行文等方面, 对后世产生的影响早已成为共识。其实, 《七发》的影响远不止这些较为表层、显见的方面。在更为深广的方面, 后代“七体”赋作仍可见《七发》之余绪。《七发》的主旨及其实现方式就是其中最重要的深层影响因素, 对唐前七体作品产生了重要影响, 也在一定程度上界定了七体的本质特征。

关于《七发》的主旨, 多认为是通过“问疾”而“戒奢”。如有人说: “作者要将其所否定的方面推向极端, 以警世人。同时, 与其所讲述的田猎、观涛两方面生活的描写构成了跌宕之势, 表明吴客所讲述的内容同太子习以为常的生活有较大的差别, 因此太子的态度、作者所强调的程度, 都有不同。”^[1] 又如说: “《七发》的作者, 针对当时封建统治阶级生活的极端荒淫奢侈, 腐朽腐烂, 提出了尖锐的批评, 讽喻性, 思想性较鲜明。”^[2] 类似观点随处可见。对于《七发》的主旨, 多数学者均认为作者是通过问病以达到“戒奢”的目的。这一认识并无不妥, 也符合《七发》的文本实际, 但同时也应看到, 《七发》还有一条并行不悖甚而是更为重要的主题线索, 即激励主上举贤任能, 这一点往往为多数学者所忽视。

这在《七发》的序言和最后一段中有隐性的表现, 序云: “客曰: ‘今夫贵人之子, 必宫居而闺处, ……故曰: 纵耳目之欲, 恣支体之安者, 伤血脉之和。且夫出舆入辇, 命曰蹶痿之机; ……虽令扁鹊治内, 巫咸治外, 尚何及哉! 今如太子之病者, 独宜世之君子, 博见强识, 承间语事, 变度易意, 常无离侧, 以为羽翼。淹沉之乐, 浩唐之心, 遁佚之志, 其奚由至哉!’ 太子曰: ‘诺。病已, 请事此事。’ 客曰: ‘今太子之病, 可无药石针刺灸疗而已, 可以要言妙道说而去也, 不欲闻之乎?’ 太子曰: ‘仆愿闻之。’”^[3] 从这里可以看出, 吴客除了指出太子之病根在于“久耽安乐”外, 还直接指出根除疾病的方法: “今如太子之病者, 独宜世之君子, 博见强识, 承间语事, 变度易意, 常无离侧, 以为羽翼。淹沉之乐, 浩唐之心, 遁佚之志, 其奚由至哉!” 显然, 吴客认为要根除这种由安乐导致的疾病, 除“戒奢”之外, 更重要的是要有“宜世之君子”常在左右, 希望太子励精图治, 举贤任能, 这是吴客的最终目的。但太子对吴客的建议显然了悟不深, 只是应付性地说: “诺。病已, 请事此事。”等病好了再做吧, 关注的仍是当下的疾病。面对自己的劝谏不被理解, 吴

* 收稿日期: 2011-03-03

作者简介: 李宏伟(1957-), 男, 重庆市人,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, 副教授, 主要研究中国古代文学。

客只能改变战略,不再直接劝其重贤,而是紧扣太子的关注点疾病、治病,卖关子式地引诱太子听他的疗疾新法,“要言妙道”,一步步使太子了悟。

《七发》末段终于将吴客的主题水到渠成地推举出来:“客曰:‘将为太子奏方术之士有资略者,若庄周、魏牟、杨朱、墨翟、便娟、詹何之伦,使之论天下之精微,理万物之是非。孔、老览观,孟子持筹而算之,万不失一。此亦天下要言妙道也。太子岂欲闻之乎?’于是太子据几而起,曰:‘涣乎若一听圣人辩士之言。’怵然汗出,霍然病已。”吴客极力渲染的“音乐”、“美食”并没有使太子好转,“游猎”、“观涛”虽使他稍有起色,但最终使他“霍然病已”的,则是吴客所言的另一种“要言妙道”:群贤毕至,并与序言中的“宜世之君子,以为羽翼”前后呼应。由此可见,《七发》表面上是吴客为公子疗疾、劝其“戒奢”,实则不止于此。吴客除劝谏公子走出奢淫的生活外,更重要的是希望他能励精图治,举贤任能。

吴客希望太子举贤任能,其深层意蕴是作者对君臣(主下)关系与君臣知遇的思考。作为文臣,都希望能够君臣知遇、关系和谐,因而君臣(主下)关系历来是文臣表达的重要主题,在汉代尤其如此。有学者说:“就这些作品的一致性而言,却为后人研究汉代文学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线索,从中可以看到,遇与不遇这个富有哲学意味的人生课题,成为两汉文学的重要主题。它不但普遍内在于设辞类作品,而且贯串于其他各类文学样式,是研究两汉文学不可忽视的一个侧面。”^[4]确实,从设辞类作品论及其他文学样式,“遇与不遇”是两汉文学的重要主题。《七发》就正是从这一角度演绎了两汉文学的这一重要主题,寄托了作者对主上的讽谏之意,在主上身上寄托了知遇情结。

毋庸置疑,讽谏主上举贤任能是《七发》的重要主旨。

二、《七发》及“七体”的文学渊源

关于《七发》及“七体”的文学渊源,前人多有论述,如“《鬼谷子》说”、“《管子》说”、“诸子说”、“《七谏》说”等。刘熙载、章太炎、钱钟书等人还认为其源出于《招魂》、《大招》,章学诚云:“孟子问齐王之大欲,历举轻暖肥甘、声音采色,《七林》之所启也。而或以为创之枚乘,忘其祖矣。”^[5]李善云:“《七发》者,说七事以启发太子也。犹《楚辞·七谏》之流。”^[6]²¹¹ 本文认为,一种文学现象、文学题材的产生,其影响因素必然是多向多层次的,《七发》或多或少、或深或浅受到上述各种因素的影响。《管子·七臣七主》、《鬼谷子·七箴》、《七谏》三种说法,主要着眼于形式结构方面:均以“七”名篇,以七段主要内容表达主旨。《管子·七臣七主》的影响更为直接,直接确立的是“6+1”的“六过一是”模式。

将其源头归于《招魂》、《大招》,钱钟书说:“将招魂之法移动于疗疾病,只是将平铺改为了层进而已。”^[7]认为其影响因子是平铺渲染的文学技法,这有一定道理。但从另一个角度看,《招魂》、《大招》对《七发》的影响远不止此。二者对比可以看出,《招魂》、《大招》在主旨上的影响也是重要因子,王逸说:“放佚,厥命将落。故作《招魂》,欲以复其精神,延其年寿,外陈四方之恶,内崇楚国之美,以讽谏怀王,冀其觉悟而还之也。”^[6]¹⁷⁵《招魂》除了延续寿命的意图之外,还有讽谏怀王以使其重用屈原的目的。《大招》有相近的主旨,王逸说:“故愤然大招其魂,盛称楚国之乐,崇怀、襄之德,以比三王,能任用贤,公卿明察,能荐举人,宜辅佐之,以兴至治,因以风谏,达己之志也。”^[6]¹⁹² 寄托君臣知遇理想,讽谏主上举贤任能,是这些作品的重要主旨。从文本实际看,这种讽谏意图是通过独特的方式展现出来的,铺排、宛转是其基本特征。以《招魂》为例,前半部分极言四方之地、上天、幽都不可托,分别罗列四方以及上天和幽都之害,以招其“魂兮归来”。后半部分又极力渲染故乡之美,包括“居室之美”、“室中之观”、“食多方些”、“女乐罗些”等。文本表面上洋洋洒洒,极力铺排,真正的深层主旨隐藏在这一铺排之下,通过宛转而非直接的方式表现出来。对比《招魂》、《大招》与《七发》,不难看出,讽谏主上举贤任能的主旨,以及宛转铺排的展现方式,对《七发》产生了深层次的影响。

依此思路可以发现,以上诸多说法看似莫衷一是,其实大多有一种深层的共性。如“《七谏》说”,李善认为:“《七发》者,说七事以启发太子也。犹《楚辞·七谏》之流。”因为《七谏》后于《七发》,因此李善此说颇遭诟病,不少学者认为李善漠视事实^[8]。不可否认,《七谏》当晚于《七发》,但同时更应看到,李善并非忽略或漠视这一简单事实,其说法更有深意。对比《七谏》与《七发》可以看出,《七谏》与《七发》除命名

相似、结构相近外,更为深层的相近之处还在于《七谏》的主旨与《七发》相类。细研《七谏》可以看出,此篇多悲悯屈原,重要内容是屈原的时命乖舛、不得伸展。如《谗谏》一章:“列子隐身而穷处兮,世莫可以寄托。众鸟皆有行列兮,凤独翔翔而无所薄。经浊世而不得志兮,愿侧身岩穴而自托。欲阖口而无言兮,尝被君之厚得。独便愒而怀毒兮,愁郁郁而之焉极。念三年之积思兮,愿壹见而陈词。”^{[6]230}这里悲叹的正是屈原人格高尚、才华出众却不得任用、君臣不知而无奈之极的境遇,类似哀叹在本篇中层出不穷,对君臣关系的慨叹、臣下不得任用的愤懑无奈是本篇的核心,《七谏》的深层主旨也就是反复劝谏主上关注君臣关系,举贤任能。当然,这一主旨仍然是隐在的、深层的,主旨的展现仍然通过宛转、铺排的方式实现。其前后罗列《初放》、《沉江》、《怨世》、《怨思》、《自悲》、《哀命》、《谗谏》七章,极力展现其“殷勤之意,忠厚之节”^{[6]211}。这样看来,李善说《七发》是《七谏》之流,其实更为侧重两者的深层关联,而不仅是篇题相近。其所言“……之流”,也未必确指《七发》乃《七谏》之后起。“流”字除有与“源”相对的末流之意外,也有“类派”、“流派”^[9]之意,如《汉书·艺文志》所言“儒家者流,盖出于司徒之官”,即指一派、一类。所以,李善所言当为“《七发》是《七谏》一类作品”之意。

三、《七激》主旨的承变

从现存文献看,《七发》之后一段时间内并没有立即形成模拟创作风气,直到东汉此风方盛,这批作品有东汉初期傅毅《七激》、刘广世《七兴》、崔骃《七依》,其后崔瑗《七苏》、李尤《七款》、张衡《七辩》、马融《七广》、桓麟《七说》、桓彬《七设》、崔琦《七翻》、刘梁《七举》等。可惜保存较为完整的只有《七激》、《七辩》两篇,《七激》是《七发》之后较早的模拟之作,与《七发》的比较也显得格外重要。

在《七激》中,主客双方分别是徒华公子和玄通子,主方游心黄老执意隐遁,客方列举诸事启发主方劝其出世,主方最终弃隐从仕。客方为达到劝谏目的,连铺音乐、美食、车马、校猎、宫苑、盛世六事(而非七事),这在七体赋中少见,原因不明,抑或作者为殊异于《七发》而有意为之。从其相同处看,《七激》对《七发》较为明显的模仿有:题名相似;选取题材近似,其铺排之音乐、美食、车马、校猎、宫苑五事,直接承于《七发》;文学描写风格技法也有较明显的相似。这些都已为学者们所见。从其不同处看,前人总结的差异主要有:第一,题材内容上进行了较大改动,由《七发》的“问疾”变成“招隐”;第二,序言简化;第三,《七发》为诸子多派思想并存,《七激》为儒家入世思想独存;第四,《七发》采用的是“六过一是”的模式,充满讽刺之意,而《七激》对音乐、美食、车马等的铺排则是颂美之情。

应该说,这些总结有其合理之处,但仍有深入探讨的余地。首先需要探讨的是《七激》的主旨。如说:“从题旨方面看,后世‘七’体由《七发》通过‘问疾’告诫膏粱子弟,转变为通过‘招隐’劝告隐者入仕。……‘七’体题旨的这种转变,带来了一系列新变化。首先是情感倾向由‘刺’变为‘颂美’。”^[10]应该承认,《七激》的题材内容确实已由“问疾”变为“招隐”,但主旨却并非只是“颂美”。从表面看,作者对前五事的铺陈充满赞美之情,最后一事对当今盛世的描写最终促动隐士的从仕,赞美之意溢于言表。但结合其时代背景及文本实际看,这都是表面现象,深层主旨仍在讽谏。对此,王德华认为“讽谏”是包括《七激》在内的唐前“七体”的基本特征^[11]。

还要进一步指出的是,《七激》作为《七发》之后较早的“七体”,其讽谏核心仍是“举贤任能”,这可从最后一段对当今盛世的描绘中窥见:“玄通子曰:‘汉之盛世,存乎永平,太和协暘,万机穆清,于是群俊学士云集辟雍,含咏圣术,文质发蒙,达义农之妙旨,照虞夏之典坟,遵孔氏之宪则,投颜闵之高迹。推义穷类,靡不博观,光润嘉美,世宗其言。’公子矍然而兴曰:‘至乎,主得圣道,天基允臧,明哲用思,君子所常,自知沉溺,久蔽不悟,请诵斯语,仰子法度。’”^{[12]707}

《后汉书·文苑列传》说:“毅以显宗求贤不笃,士多隐处,故作《七激》以为讽。”傅毅作《七激》有其社会背景和深层目的,显宗求贤不诚导致文士多隐,这为傅毅所不满。结合文本最后一段,玄通子描绘的是盛世之下“群俊学士”意气风发、得志伸展的盛况。促动公子弃隐出世的真正原因,在于玄通子所描绘的群贤毕至、君臣相得的理想境界,而不是诸多繁华享受,最终目的是讽谏君主尽心尽力地举贤任能,通过展现隐士贤人的精神追求,使君主明了贤人的渴望。两相对照,很容易体味作者在其中寄予的讽谏之

意,希望君王能够励精图治、举贤任能,而不仅是颂赞当前、启迪招隐。

其次,还要进一步说明的是,《七激》讽谏主旨的实现机制相对于《七发》而言,既有继承也有发展。

《七发》“举贤任能”这一讽谏主旨的实现主要通过三种方式:一是序言中的直言相劝:“独宜世之君子,博见强识,承间语事,变度易意,常无离侧,以为羽翼。”但明显可以看出,这种直言劝谏效果不佳,表现得也十分隐晦,作者无奈于直言的微弱效果,从而有意避免,所以,这种方式只是点到为止,而未大肆宣扬。二是对前六事的极力铺排起到反衬和逐步引导的作用。“音乐”、“饮食”等这些在序言中被贬为“伐性之斧”的奢侈享受,起的是以毒攻毒的反衬作用,让听者厌倦,逐渐走出这种生活。“田猎”、“观涛”等更进一步,是对听者的进一步引导,使公子走出奢华,进入阔大的生活境界,为最高境界的到来铺平道路。三是直接以文本实际展现自己的主张。从文本篇幅看,前六段虽有长短之别,但最末一段明显短于前六段,形成明显的差异感。这是作者对其所宣扬的“要言妙道”的直接表现,前文六段“要言妙道”洋洋洒洒,而最终一段寄托讽谏的真正的“要言妙道”才了了数言,以最直观的方式进行展现。这也是道家一直所主张的“大辩无言”、“道可道非常道”。

对比之下,《七激》深层次的讽谏功能的实现方式不同于《七发》,主要通过两种方式:第一种方式,是以反话的方式将凋敝的现实描绘为盛世,将不重贤人的当世描写为群贤毕集,以此寄托讽谏、激励和期望之意。对此,孙晶说:“傅毅赞颂永平盛世是为了招诱隐者,但永平之时却无招贤良、尊岩穴幽隐之士的举措,隐者也不会轻易出仕,因此赋末徒华公子‘自知沉溺,久蔽不悟,请诵斯语,仰子法度’,这样似乎要入世的言辞也就显得有些言不由衷了,作品的讽谏之意也因此显露出来。”^[13]第二种方式,是通过展现隐士贤人的极端期待,渴望主上明了其心迹。徒华公子面对声色享受毫不动心,而在君臣相知的盛世图景刺激之下却毅然弃隐。隐士贤人的真正期待不言而喻,也展示出作者对君主能了悟此心的渴望。

两相对比,题材由《七发》的问疾转变为《七激》的招隐之后,主旨表达更为宛转。在《七发》的主客对答中,可对现实之中的君臣(主下),客所言所谏可以较明了地映射现实中的君主;而《七激》为隐士和劝谏者的对答,劝谏的直接对象不是君主而是隐士,对现实君主的劝谏和映射更隐僻、宛转。

四、唐前其他“七体”赋作的主旨

《七发》之后,自傅毅《七激》始一改“问疾”题材,其确立的招隐题材成为唐前七体赋作的主要题材,但《七发》以来的举贤任能的讽谏主旨却如影随形,一直伴随着唐前七体赋作。其发展历程如下表所示:

表1 唐前七体赋作“举贤任能”讽谏主旨发展状况表

| 篇名 | 时代 | 与“举贤任能”的讽谏主旨相关的表述 |
|--------|----|--|
| 张衡《七辩》 | 东汉 | 是以英人底才,不赏而劝,学而不厌,教而不倦。于是二八之俦,列乎帝庭,揆事施教,地平天成。 ^{[12]775} |
| 王粲《七释》 | 东汉 | 登俊义于垄亩,举贤才于仄微,置彼周行,列于邦畿。九德咸事,百僚师师。 ^{[12]963} |
| 曹植《七启》 | 三国 | 镜机子曰:“世有圣宰,……河滨无洗耳之士,乔岳无巢居之民。是以俊义来仕,观国之光,举不遗才,进各异方,赞曲礼于辟雍,讲文德于明堂,正流俗之华说,综孔氏之旧章。” ^{[14]1143} |
| 陆机《七微》 | 晋 | 然圣主持盈之宾术,寤经国之在贤,各毕荣于分亩,期赞化于大钧。 ^{[15]2020} |
| 张协《七命》 | 晋 | 至闻皇风载戩,时圣道淳,举实为秋,摘藻为春,下有可封之人,上有大哉之君,余虽不敏,请寻后尘。 ^{[15]1954} |

就现在保存完整的先唐七体赋看,讽谏主上“举贤任能”,寄托君臣相得理想,的确是这些作品十分重要的主旨。当然,其“举贤任能”的讽谏主旨虽如影随形伴随着唐前七体赋,但其在不同阶段、不同作品中表现程度和方式也不尽相同。

《七激》、《七启》等作品的讽谏主旨表现得较为突出。如《七启》倒数第二段所铺排的第六事说:“镜机子曰:‘予闻君子乐奋节以显义,烈士甘危躯以成仁,是以雄俊之徒,交党结伦。重气轻命,感分遗身。故田光伏剑于北燕,公叔毕命于西秦。果毅轻断。虎步谷风,威耀万乘,华夏称雄。’辞未及终,而玄微子曰:‘善。’镜机子曰:‘此乃游侠之徒耳,未足称妙也。若夫田文无忌之俦,乃上古之俊公子也。皆飞仁扬义,腾跃道艺,游心无方,抗志云际。陵轹诸侯,驱驰当世。挥袂则九野生风,慷慨则气成虹蜺。吾子若

当此之时,能从我而友之乎?’玄微子曰:‘予亮愿焉。然方于大道,有累如何?’”^{[14]1142}

作者在铺排美食、容饰、羽猎、宫馆、声色五事之后,隐士均表示没有任何兴趣,第六事显然已更进一步触动了隐士的兴趣。内容是游侠之徒和田文、无忌之类君子,游侠之徒甘为知己者死,田文、无忌之类君子更是重贤任士的楷模。这种知音之聚、上下赏识的和谐关系促动了隐士的兴趣。在此促动之下,作者最后一段铺排当今主上的圣恩浩荡,最终使隐士弃隐。可以看出,《七启》中有十分浓重的上下知遇、君臣相得的情结,其举贤任能的讽谏主旨表现得较为明显。

当然,其他作品也时有这一主旨,但表现得较为隐晦。如陆机《七微》,最后一段极言当今盛世圣恩浩荡,其中关于君臣相知的描绘可以看作是皇恩的一个方面,其独立性并不十分明显。可以看出,这种作品也寄托了讽谏之意,但举贤任能的主旨不如《七启》等明显。

举贤任能的讽谏主旨在现存的唐前七体赋中均有体现,只是表现程度略有差异,这与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、作者自身遭遇的不同都有一定关系。应该说,隐逸之士的大量出现、君主不重励精图治、举贤任能,正是《七激》题材转换的客观原因。而之后赋作多模拟,原因则在于自《七发》以来,此种文体确立的举贤任能的讽谏主旨,很大程度上符合了文士、文臣的基本理想,为他们表达内心提供了一种较为完美的方式。要实现“兼济天下”的理想,得到主上任用是基本前提。文人之士多不如意,因不满现实而弃官的隐士多有出现,于是,讽谏主上能够举贤任能就成为文士的基本诉求。《七发》、《七激》确立的宛转表达方式,又给进谏提供了一种较为安全和方便的方式。所以,在七体赋作中此主旨一直如影随形,举贤任能成为或隐或显的七体赋的灵魂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 袁行霈. 中国文学史:第1卷[M]. 北京:高等教育出版社,1999:186.
- [2] 迟文浚,等,主编. 历代赋辞典[M]. 沈阳:辽宁人民出版社,1992:38.
- [3] 严可均. 全汉文[M]. 北京:中华书局,1958:237-238.
- [4] 李炳海. 两汉文学的情理世界[M]. 长春: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,2000:19.
- [5] 叶瑛. 文史通义校注[M]. 北京:中华书局,1994:62.
- [6] 洪兴祖. 楚辞补注[M]. 南京:凤凰出版传媒集团、凤凰出版社,2007.
- [7] 钱钟书. 管锥编[M]. 北京:中华书局. 1979:634.
- [8] 熊良智.“七体”文三说[J]. 西南民族学院学报:哲学社会科学版,2002(9):50-52.
- [9] 辞源[M]. 北京:商务印书馆,1998:1786.
- [10] 郭建勋.“七体”的形成发展及其文体特征[J]. 北京大学学报:哲学社会科学版,2007(5):53-59.
- [11] 王德华. 唐前七体讽谏功能发微[J]. 学术月刊,2010(2):96-104.
- [12] 严可均. 全后汉文[M]. 北京:中华书局,1958.
- [13] 孙晶. 称谓调遣显匠心[J]. 社会科学战线,2002(3):118-123.
- [14] 严可均. 全三国文[M]. 北京:中华书局,1958.
- [15] 严可均. 全晋文[M]. 北京:中华书局,1958.

责任编辑 韩云波